

闻一多的《周易》社会史史料学研究

周晓瑜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在20世纪《周易》历史学研究领域,闻一多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的《周易义证类纂》、《周易杂记》是关于《周易》的社会史史料学研究;《周易新论》是为《周易》社会史史料学研究做时代背景、理论方法上的准备;《周易字谱》、《周易分韵引得》是关于《周易》用字的分韵长编,是为《周易》社会史史料学研究做文字音韵训诂语义解释方面的资料准备。闻一多的《周易》研究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史史料学基本体系和内容。同时,由于他综合运用了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和西方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符号学、语义学、解释学的方法,追求文献史料的真实性,对《周易》符号学、《周易》解释学、《周易》语义学和《周易》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关键词:闻一多;周易;社会史;史料学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06)01-0081-07

WEN Yi-duo's research on the bibliography of social history conceived in *Zhouyi*

ZHOU Xiao-yu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WEN Yi-du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udies of history exposed in *Zhouyi*. His *Zhou yi yi zhen lei zuan* 周易义证类纂, An Edit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Different Events in *Zhouyi*, and *Zhou yi zai ji* 周易杂记, Miscellanies on *Zhouyi*, relate to the studies of bibliography of social history; His *Zhou yi xin lun* 周易新论, New Views on *Zhouyi*, is a theoretic preparation of background for the studies of social history in *Zhouyi*; His *Zhou yi zi pu* 周易字谱, The Graphology in *Zhouyi*, and *Zhou yi fen yun yin de* 周易分韵引得, The Prosody in *Zhouyi*, are a long compilation of the paradigm of rhymes in *Zhouyi*, a preparation of materials for a graphic and prosodic interpretations for the bibliography of social history in *Zhouyi*. His studies of *Zhouyi* constitute a basic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the bibliography of ancient China's social history. Meanwhile, owing to his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not only the approac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extual research but also those of western sociology, cultural anthropology, semiotics, semantics, and hermeneutics to guarantee the authenticity of historical data, his achievements are of great value for the studies of semiotics, semantics, hermeneutics and culture anthropology embraced in *Zhouyi*.

Key words: WEN Yi-duo; *Zhouyi*; social history; bibliography

闻一多的《周易》社会史史料学研究,在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领域有着特殊的地位。20世纪对《周易》进行历史学的研究,是《周易》研究史上的一个大问题,也是中国现代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大问题。因为此时对《周易》进行历史研究,在方法论上有两大特点:第一,是把《周易》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挂上了钩,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评价了《周易》(主要指《易传》)的哲学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发掘了《周易》在古代社会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使《周易》研究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收稿日期:2005-09-12

作者简介:周晓瑜(1950—),女,重庆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学史、历史文献学。

分。如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一篇《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等系列文章的研究。第二,是把《周易》与中国社会史研究挂上了钩,在方法论上是把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方法与西方符号学、语义学、解释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相结合,发掘了《周易》的社会史史料的科学价值,不仅把《周易》纳入中国古代社会史学,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使《周易》研究初步具有了《周易》符号学、《周易》语义学、《周易》解释学、《周易》文化人类学的价值取向,这就是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周易新论》等系列论文的研究。

闻一多在学界的影响与郭沫若有所不同,郭沫若关于《周易》研究在他所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地位,学界尽知,并且已有学者撰文论述。而闻一多,人们一般只知道他是个诗人,是个革命勇士,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个学者,知道他是《周易》研究专家的,就更少了。本文仅就闻一多关于《周易》社会史史料学成就进行研究分析。

一

闻一多对《周易》进行社会史史料学研究,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

在西方,社会史研究是应社会需要出现的,是为着解决新出现的社会现实问题。英国工业革命以后,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出现城市问题,乡村问题,就业问题,婚姻问题,家庭问题,教育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在历史上形成的。社会现实为史学家提出了社会史的课题。法国新史学先驱西米昂(F. Simiand)首先提出历史研究要“屏弃个体而研究社会”,此后年鉴学派应运而生。年鉴派史家以社会史为前沿领域,加上经济、文化意识结构的研究来把握社会演变的规律。他们认为:“历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是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因此,“从定义上讲,历史在整体上就是社会性的。”^[1]他们反对短时段的事件史研究,提倡整体地、总体地研究历史,希冀创立一种与传统史学以叙述具体政治事件相对立的“总体史”,并将这种历史称之为“社会史”。所以,社会史“是一个史学新范式,一个取代传统史学的政治史范式的新范式”,“它并不只是重新发现一个以往被遗忘了的角落,它是一场革命,它是使史学家的眼界、方法、材料统统发生变化了的一场革命”。^[2]二战以后,年鉴学派进入了鼎盛时期,成为法国当代史学的主流。其理论与方法也影响着当代西方整个史学界。

中国传统史学,虽不尽像梁启超所说的“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只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3]但是,综观两千余年的中国传世文献,重政治,轻经济,轻文化,轻社会基层人民的一切社会生活则是不诬的事实,大致是一部政治史。历史的车轮转到20世纪,中国社会经历了天崩地解的剧烈动荡,史学也面临着范型转变的紧迫,面临着许多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史学界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中国社会历史是否经过奴隶制阶段问题”、“商业资本主义问题”、“近代中国是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问题”^[4]等展开了一场“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大论战。论战的结果,产生了一大批社会史名著,也产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闻一多的《周易》社会史史料学研究,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社会史”的任务“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5],把研究的对象、范围、方法急剧地放大了。闻一多把眼光投向了上古社会史。然而,研究上古社会史,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史料缺乏。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在研究夏、商礼制的时候就曾感叹可供征引的证据不足。他说: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6]

意思是:夏代的礼制,我能说出来,但它的后代杞国没有史料可征引;殷商的礼,我能说出来,但它的后代宋国没有史料可征引。这都是文献史料不足的原故。如有足够的文献史料,就可以引来证明我所阐述的夏、商礼制了。此后,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也曾批评古人记史“轻事重言”,致使上古兴废之史“万不记一”,使后人对唐尧以来的历史不甚清楚。他说:

上起唐尧,下终秦穆,其《书》所录,唯有百篇。而《书》之所载,以言为主。至于废兴行事,万不记一。语其省略,可胜道哉?故今后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史通·疑古》》^[7]

20世纪社会史大论战中所讨论的一些问题,比如:“中国社会历史是否经过奴隶制阶段问题”就直接涉及到上古史史料。当然,闻一多《周易》社会史史料学研究,从总体上说是为着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社会背景出发的。然而,也正适应了中国现代史学建设的急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是同科学意义上的史料学的建立相适应的。“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非常必要,这是先决问题。但有了正确的历史观点,假使没有丰富的正确的材料,材料的时代性不明确,那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史料苦于不多,而这苦于不多的史料却又苦于包含着很多困难的问题,这就限制了我們所能获得的应有的成果。”(1954年新版引言)^[8] 闻一多的《周易》研究,做的正是科学史料学的工作。

闻一多对《周易》社会史史料学研究,下了惊人的工夫。这个工作大约是1932年8月他到清华大学作教授以后开始的。当时,闻一多在经历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人事纠纷之后,来到自己的母校。决定“向内转”,即不再担任行政职务,潜心治学。当时的清华大学,在中文系任职的教授有朱自清、俞平伯、陈寅恪、杨树达、刘文典等五人,讲师有黄节,专任讲师有王力、浦江清、刘盼遂,教员有许维遹,助教有余冠英等。闻一多以新派诗人的姿态挤身于这些名师巨儒之类的教授行列。清华大学的教学、研究传统与现实环境,使得闻一多的教学、研究自然要向中国主体学术——史学、文学靠拢,而要研究史学、文学,就不得不一方面继承乾嘉以来考据学的传统,另一方面及时吸收运用社会学、符号学、解释学等西方理论与方法。这时候,可以说,闻一多五岁入私塾所学《尔雅》、《汉书》等中国传统之学,十三岁入清华,十年的清华留美预科教育和三年留美的西洋教育取得了完美的结合。知识结构的传统与现代相融,方法论的古典与西洋联袂,必然要造就一代新型的学术大师。

闻一多一向以治学执着、勤奋闻名。1937年10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闻一多继续《周易》研究工作。冯友兰先生曾回忆说:

清华在南岳麓山的校舍只建成了很小一部分,不能用,只好把理、法、工三个学院设在长沙市内,把文学院设在长沙以南一百多里地的南岳市。南岳市是衡山脚下的一个市镇。南岳庙就建在这里。在南岳市附近几里地的地方,有一所教会学校,叫“圣经学校”。后靠着衡山,大门前边有一条从衡山流下来的小河。大雨之后,小河还会变成一个小瀑布。地方很是清幽。在兵荒马乱之时,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读书,师生都很满意。在这里教师同住在一座楼上。楼在山坡上,每次到饭厅吃饭,要上下爬二三十级台阶。大家都展开工作。汤用彤写他的中国佛教史,闻一多摆开一案子的书,考订《周易》。学术气氛非常浓厚。^[9]

当时,闻一多常与汤用彤讨论《周易》。后来,学校迁至昆明,1939年暑期在晋宁休假,闻一多继续批阅此书。他发现《周易》许多内容实为上古社会史史料。1942年还曾为学生们讲授过《周易》研究的课程。可以说闻一多《周易》研究的准备工作开始于清华,《周易》社会史史料学研究进行于西南联大,《周易》研究伴随了他的后半生。可惜的是,目前我们看到的闻一多《周易》研究六种成果,似乎都是未完稿。他关于《周易》研究的理想还未实现,便于1944年英勇牺牲了。所以,在翻阅、研读闻一多先生《周易》六种成果的时候,心中总是沉甸甸的。

二

闻一多《周易》研究的成果很多,计有《周易义证类纂》、《周易新论》、《周易杂记》、《周易字谱》、《周易分韵引得》、《易林琼枝》等六种。依内容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周易义证类纂》、《周易杂记》是关于《周易》的社会史史料研究,是闻一多《周易》研究成果的核心部分。他在《周易义证类纂》引言中宣称:“以钩稽古代社会史料之目的解《周易》,不主象数,不涉义理,计可补苴旧注者百数十事。”^[10] 第二类,《周易新论》、《周易字谱》、《周易分韵引得》,这三种都是为着研究《周易》社会史史料做准备的。《周易新论》是理论方法上的准备,后两种是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资料准备。第三类,《易林琼枝》,是研究《易林》诗学的。此类这里不论。

闻一多说,《周易义证类纂》钩稽的中国上古社会史史料“百数十事”,即一百多条。我们现在统计,《周易义证类纂》88条,《周易杂记》30条,两书凡118条。这就是关于《周易》时代118条社会史史料。

同时,也是《周易》社会史史料 118 处文字记载方面的难点。闻一多对此逐条进行文字训诂学的、解释学的、社会史史料学的解释。郭沫若为开明本《闻一多全集》所写的序言评价说:“他对于《周易》,《诗经》,《庄子》,《楚辞》这四种古籍,实实在在下了惊人的很大的工夫。就他所已成就的而言,我自己是这样感觉着,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之说,看上去似有过誉之嫌,其实就《周易》研究来说,并不过分。当我们读着《周易义证类纂》、《周易杂记》,感觉上似在研读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念孙的《读书杂志》,而观念上又比钱、王二氏新颖、明确。其训诂考据方法源于乾嘉而超越了乾嘉,其语义阐释,往往石破天惊,颠扑不破,至今确也少见来者。

闻一多说,他的《周易》研究,目的在于“钩稽古代社会史料”。要研究《周易》的社会史史料,首先要解决好两个问题。

第一,我们所看到的《周易》,包括了经和传两部分,所谓《周易》是指什么?闻一多在《周易新论》中,有一节专论“何谓‘周易’”。认为《周易》就是周王朝的“易”,《周易》就是一般所说的《易》古经。显然,这里所说的《周易》是不包括大传的。闻一多在“经文的长成”一节还说:“宗周残破,史官携以归鲁。此后,王朝占筮之辞固亦可称‘周易’,但非今本《周易》也。”意思是,这里所说的《周易》是指史官携以归鲁的那一种本子,此后的增订本虽可称为“周易”,但不是今本《周易》。又说:“至于列国筮辞,则单可称‘易’,而不得言‘周’。”这又把《周易》与列国筮辞区别开来。

第二,要研究《周易》的社会史史料,就必得确定它所反映的时代。闻一多认为,《周易》不出于一人一时之手。他在“经文的长成”中说:“卦辞、爻辞是周史官长时期占筮的积薪式的记录。一卦或一爻中,词意每不连属,叙述毫无义例。历时甚久,颇有断烂,故文字不免讹夺错悞。”他根据《周易》中有殷周间的故事,有同于西周的礼俗,有同于《诗经》的文句,断定《周易》的产生“约始于殷周之际,止于西周。”这样,他所考证的《周易》社会史史料,就是殷周之际到西周时期的社会史史料。

三

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史学传统,有着汗牛充栋的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制体等历史文献。但是,凡读过古代历史著作的都有这样的体会:留下的印象不是帝王,就是将相。有关经济,民生,婚姻,家庭等等社会内容很少看到。所以,梁启超批评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3]四病是有道理的。显然,传统史学在内容上有巨大的局限性。那么,“社会史”史学应包括哪些内容呢?“社会史研究的社会现象,是最常见、最大量、最生动、最富变化、最具人情的”的那一部分,“侧重于社会下层的社会生活部分及一些基础制度部分”。^[6]虽然“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至今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它的广泛性、科学性远远超过传统史学是无疑的。20 世纪 40 年代,闻一多写《周易》社会史史料研究的时候,更没有一个“社会史”的框架和体系可供套用。所以,闻一多的研究具有提供《周易》社会史结构和社会史内容的双重作用。

闻一多在《周易义证类纂》中把社会史史料分为 4 大类 21 小类。

(一)有关经济事类,包括:

1. 器用;2. 服饰;3. 车驾;4. 田猎;5. 牧畜;6. 农业(雨量附);7. 行旅。

(二)有关社会事类,包括:

1. 婚姻;2. 家庭;3. 宗族;4. 封建;5. 聘问;6. 争讼;7. 刑法;8. 征伐(方国附);9. 迁邑。

(三)有关心灵事类。包括:

1. 妖祥;2. 占候;3. 祭祀;4. 乐舞;5. 道德观念。

(四)余录。

“余录”一项是不便于归入以上三类的内容。闻一多自注说:“以下无类可入者如(若)干条,亦足补充旧注,今并录之务参览焉。”

闻一多所谓四大类,其核心实际是“经济事类”、“社会事类”、“心灵事类”三大类。大类之下的小类是该类的具体方面,也是《周易》本身固有的内容。这样,便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史——→三大类(经济、社会、心灵)——→二十一小类(器用、服饰、车马、田猎、牧畜、农业、行旅等)”三级体系,形成了“中国上古社会史”学科意义上的基本结构,基本内容,基本体系。这是闻一多借《周易》社会学的研究对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贡献。这个结构展示的是商周之际社会的整体性。这种历史整体性是通过采用社会史研究途径与角度才获得的。

闻一多《周易》社会史史料的内容非常丰富。共分4大类,21小类,118条,基本上反映了殷周之际到西周时期人们社会生活的历史面貌。

第一类,“有关经济事类”,也就是人们的经济生活史史料。经济生活是人们的根本生活,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我们以“器用”、“车驾”、“农业(雨量)”三类为例。

“器用”指食器、农器、兵器等日用物品。《周易·泰》九二有:“包荒用冯河不遐遗”句,历来众说纷纭。闻一多释“包”为“匏”的借字。《姤》九五“以杞包瓜”,《经典释文》引《子夏传》和正义并作“匏瓜”为证。从而认为“包荒”是“匏瓜”之转语。“匏瓜”就是今天所说的大葫芦,既指这种植物,也指这种植物的果实。“冯”是徒步涉河。“不遐”,不至。“遗”是“隕”的借字,意思是坠溺。“包荒用冯河不遐遗”,当读为“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是说大葫芦,可以用来渡河,不会沉溺水中。于是举了《诗·匏有苦叶》曰:“匏有苦叶,济有深涉”。《国语·鲁语》下曰:“叔向……曰:‘夫苦匏不材,于人共(供)济而已,鲁叔孙赋《匏有苦叶》,必将涉矣。’”《说文》“匏”“瓠”互训,故又或言“瓠”。《庄子·逍遥游篇》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络)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字亦写作“壶”。《淮南子·说林篇》曰:“尝抱壶而渡水者,抱而蒙火,可谓不知类矣”。《鶡冠子·学问篇》曰:“中流失船,一壶千金”(《刘子·陵时篇》作“瓠”),崔豹《古今注·音乐篇》曰:“有一白首狂夫,披发提壶,乱流而渡。”为证,说明上古这种葫芦用作渡河的漂浮器的事实。

“车驾”泛指古代车上的用品,包装饰品。

《周易·革》九五有“大人虎变”,上六有“君子豹变”。闻一多认为“𧈧”与“变”是古今字,而“𧈧”与“鬻”古字通。《牧豎》、《罍鬻》中的“朱𧈧”在《毛公鼎》作“朱鬻”,由此推知“鬻”与“𧈧”同义。而“𧈧”经传作“鞞”如《诗·齐风·载驱》“鞞鞞朱鞞”,就是金文的“朱𧈧”。“变”与“鬻”同,“𧈧”与“鞞”同,那么,“虎变”、“豹变”就是“虎鞞”、“豹鞞”的意思。这是第一层。第二层,新出土《熹平石经》中《革》九五“大人虎变”,上六“君子豹变”,“变”作“辨”,而“辨”又通“斑”,《说文·文部》:“辨,驳文也。”也就是杂色的花纹。《广韵》“辨”同“斑”。《文选·上林赋》:“被斑文。”李善注:“斑文,虎豹之皮也。”《七启》:“拉虎摧斑。”李善注:“斑,虎文也。”虎豹的花文,字也作“斑”。春秋楚国“斗谷於菟”字“子斑”。“於菟”就是楚国方言“老虎”的意思。《汉书·叙传》说:“楚人谓虎文斑。”金文文献的异文,传世文献的通假,都证明“大人虎变”就是《礼记·玉藻》说的国君车上的虎皮装饰,“君子豹变”就是大夫士(上士)车上的豹皮装饰。

《革》上六有“小人革面”。闻一多经过复杂的考证认为,“面”通“鞞”。《说文》无“鞞”字。玄应《一切经音义》引《苍颉篇》:“鞞,覆也。”“革鞞”就是车上覆盖的革制的装饰品。这里的“小人”指下士。“小人革面”就是下士车上的革制的装饰口。

从国君到下士,车上都用虎皮、豹皮、革做装饰,证明时代距游猎生活不会太远。

“农业”,这里主要说明一下闻一多发现的《周易》中记载的下雨问题。下雨与农业关系极大,因为上古是靠天吃饭的时代。

《临》六三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闻一多认为,“临”是“灑”的假字,“灑”与“霖”同,指久下不停的雨。“甘”是“厭”(今简化为“厌”)的假字。《说文》“厭”从“𧈧”声,“𧈧”从“甘”声。《诗·伯兮》:“甘心首疾”毛传:“甘,厭也。”“厭”的意思是足,足够。于是举了大量的例子说明古代“甘雨”、“甘露”都是雨水充足的意思。六三中的“甘霖”是同义词复用,指充足的雨水。雨水充足称为“厉”,雨水过量也称为“厉”。六三“甘临,无攸利”是说雨水过大了,没有好处。

闻一多还通过大量的例子说明“忧”是“𧈧”的借字。引《庄子·则阳篇》郭注曰:“𧈧,锄也。”又以《管子·小匡篇》曰:“深耕均种疾灑,先雨芸耨,以待时雨”,《国语·齐语》:“深耕而疾耨之,以待时雨”。说

明久雨伤农,但是在下雨之前锄好地,下起雨来也就不足为害了,所以说“既忧(耨)之,无咎”。

另外,《临》卦辞:“临……至于八月有凶。”表示雨水下到八月,有危险。这是黄河流域的气象。

又《临》六四有“至临”,六五有“知临”,上六有“敦临”。闻一多通过文字音韵训诂考证,“至”通“罍”,“罍”训大,“知”训疾,“敦”训暴。那么,“至临”就是大雨,“知临”就是疾雨,“敦临”就是暴雨。

以上,以大葫芦渡河,以虎皮、豹皮饰车,有大雨、疾雨、暴雨、下得过分的雨,但是如果先锄好了地,雨下得大一点也不足为害,……闻一多通过这些内容的研究,构成了上古社会的自然生态环境与原汁原味的生活画卷。

第二类,有关社会事类,也就是人们的社会的组织,社会的关系。闻一多首先从“婚姻”讲起,由此出发,于是有:家庭、宗族、封建、聘问、争讼、刑法、征伐(方国附)、迁邑等,构成了上古人们的立体的动态发展的社会组织和关系。

我们仅举“宗族”中的例子,加以说明。在《屯》六二、《睽》上九、《贲》六四有“匪寇婚媾”,《屯》六四有“求婚媾”,《震》上六有“婚媾有言”。对“婚媾”一词,旧注一般释为嫁娶。但自梁启超以来,又多释为抢婚、劫掠婚,并认为是远古婚俗的遗留。闻一多引用许多铜器铭文和传世文献中的例子,证明“婚媾”即指亲戚。并认为《屯》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说的是驾着四马拉的大车,去求他的亲戚家。《屯》六二、《睽》上九、《贲》六四中的“匪寇婚媾”,则说的是不是仇家,是亲戚。如果我们按照劫掠婚去理解,会有很多难以讲通的地方。更何况商周之际是个婚姻颇为自由的时代,何来劫掠婚呢?闻一多的解释发意新颖,使人耳目为之一明,为“婚媾”这个词义,为含有“婚媾”的相关的句子定了案。同时对商周婚俗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认识。

第三类,有关心灵事类,是精神生活方面的内容,有妖祥、占候、祭祀、乐舞、道德观念等几个方面,闻一多也讲得精义纷呈,如《乾》卦“潜龙”、“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见群龙无首”,闻一多认为都是指“龙星”,也就是东宫苍龙之星等。并证明中国古代占星术产生甚早。

这就是上古社会现象中,“最常见、最大量、最生动、最富变化、最具人情的”的那一部分,“侧重于社会下层的社会生活部分及一些基础制度部分”。

四

关于闻一多研究《周易》社会史史料学的方法,只有当我们有了真正深入研究的实践和体会,才会真正理解研究方法之类的东西。如果没有深入研究的实践和体会,是不可能理解研究方法之类的东西的。所以,我们还是认真考察闻一多的成果,看看闻一多自己是怎么说的。

闻一多对古代文献的研究,出发点大都是文学史。先是研究唐诗,后又研究《诗经》、《庄子》、《楚辞》、《周易》。他研究《楚辞》时间最长,体会也最深。他在《楚辞校补·引言》中说:

较古的文学作品所以难读,大概不出三种原因。(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因年代久远,史料不足,难于了解;(二)作品所用的语言文字,尤其那些“约定俗成”的白字(训诂家所谓“假借字”),最易陷读者于多歧亡羊的苦境;(三)后作品而产生的传本的讹误,往往也误人不浅。《楚辞》恰巧是这三种困难都具备的一部古书。所以在研究它时,我曾针对着上述诸点,给自己定下了三项课题:(一)说明背景,(二)解释词义,(三)校正文字。^[10]

《周易》为群经之首,时代是最古的。闻一多所说的研究“较古的文学作品”的三种困难,在《周易》的研究过程中不仅会遇到,其难度甚至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他的《周易》社会史史料学研究也是遵照他所定的三项基本课题进行的。那就是说,研究任何一部古籍,都要首先考察清楚时代背景与作者思想,校正准确文字,解释清楚词义。这是进行专业研究的基础。

闻一多《周易》研究是怎样给自己确定课题的?我们可以通过《周易新论》中一些专题研究窥其一斑:(一)传说中的《周易》作者;(二)伏羲与八卦;(三)何谓“周易”;(四)孔子与《易》;(五)《周易》的成长:(1)卦爻,(2)卦爻辞,(3)说卦、序卦、杂卦;(六)数卜与字卜;(七)“易学”之兴起(象、系辞、彖、文言);(八)易学的流变——经学与纬学。附录:《周易》版本考略,古籍论《易》,古籍引《易》,古籍引《易传》,古

籍引逸《易传》文，古籍中类似《易传》之语，《周易》与《太玄》，汉人用“卦”字为动词，参考书目。——这实际就是闻一多研究《周易》所作的“说明背景”的工作。

我们再看他对《周易》研究是怎样要求的。他在《周易新论》批评刘师培循拉克伯里对《周易》解释的“语汇说”时认为：“（语汇说）原则甚是（别样）。应用之范围与方法大有问题。只可解释卦爻辞之一部分。”接下来，闻一多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反映了他的研究方法：“解释一字时当顾及全句文义”、“释字义当有卜辞、金文或先秦古籍的证例，《说文》以下之训诂当慎审用之”、“释句义当于古代礼俗有证”。这既是对刘师培的批评，也是对自己研究提出的课题。其学术视野之广，学问功底之深，令人不得不叹服！

我们再来看看他自己是怎么做的。在闻一多的研究著作中，还有《周易字谱》、《周易分韵引得》两部。前者是把《周易》用字按古韵 23 部的排列，后者是把《周易》相关的句子排列在古韵 23 部中，实际是《周易》词汇资料的分韵长编。而《分韵引得》又是《周易》语句的分韵索引。闻一多研究《诗经》曾想编一部《诗经辞典》，以作文学研究的基础。这两项成果，就是闻一多为着词汇的声训，为着资料的拣选，为着比较的进行，而为自己编的分韵资料库。早在 20 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纯以手工编出这样的分韵资料库，其治学之勤奋，其态度之一丝不苟，令人不得不钦佩！

另外，在闻一多的著作中，我们常见到“社会学”、“民俗学”、“符号学”、“人类学”、“美学”、“语义学”、“解释学”一类的学科概念，这每一种“学”，其中都包含着精僻深邃的学理与方法。可是，在闻一多的著作里，我们不大见先引一段古人怎么说或西方人怎么说，再发表自己意见的两张皮的行文方式。他是把这些深刻的学理融化在头脑中，化为一种境界，体现在出手不凡的实践中，成果中。

闻一多《周易》社会史史料研究成果与方法论，都将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 [1] (法) 费弗尔. 为史学而奋斗 (Combats pour l'histoire) [M]. 巴黎, 1959. 12. 转引自何兆武.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497, 505.
- [2] 赵世瑜. 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 [J]. 历史研究, 1999, (2), 13.
- [3] 梁启超. 史学论著四种·新史学 [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242-244.
- [4] 侯外庐. 初的追求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5. 222.
- [5] 冯尔康. 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 [M].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8. 2, 12.
- [6] 论语 [M]. 十三经注疏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7] (清) 浦起龙. 史通通释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379.
- [8] 郭沫若.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4.
- [9] 冯友兰. 三松堂自序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4. 98-99.
- [10] 闻一多. 闻一多全集 [M]. 上海: 开明书店, 1948.

责任编辑: 林忠军